



“三个务必”的哲学基础、理论蕴涵及其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意义

杨海

摘要:“三个务必”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它彰显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有力保证了我们党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为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提供了精神动力,强调了在攻坚克难中必须牵住“关键少数”这个“牛鼻子”。对“三个务必”这一理论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蕴涵上,还要深入挖掘其蕴含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方法论意义,以更加有力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确保国家安全和社

关键词:“三个务必”;理论蕴涵;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3.0110

收稿日期:2023-02-20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方法论及其指导意义研究”(2020FR003)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杨海,男,江西湖口人,哲学博士,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E-mail: yanghai8889@126.com。

自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三个务必”^①以来,“三个务必”这一理论就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一些研究者们以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三个务必”这一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而又系统的研究。例如曹贤平、蒋贤斌的《“三个务必”生成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李祺、梁大伟的《“三个务必”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陈子飞、骆丹的《新时代“三个务必”的由来、内涵及进路》、汤志华的《“三个务必”的深刻内涵、内在关系和重大意义》^②,等等。这些前期研究成果都是本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本研究的特色和创新点主要在于:第一,深入挖掘“三个务必”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从中找到该理论的哲学立论根基,进一步彰显该理论的学术涵养;第二,由于“三个务必”这一理论主要是针对党的建设领域的重大风险的防范化解而提出的,故本研究将主要从全面从严治党“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牵住“关键少数”这个“牛鼻子”等维度对“三个务必”这一理论的理论蕴涵进行系统化的理论阐释;第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

①“三个务必”是习近平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于2022年10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提出的,即要求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页。

②曹贤平《“三个务必”生成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40—50页;李祺、梁大伟《“三个务必”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7—13页;陈子飞、骆丹《新时代“三个务必”的由来、内涵及进路》,《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第5—13页;汤志华《“三个务必”的深刻内涵、内在关系和重大意义》,《新视野》2023年第1期,第21—28页。

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①，本研究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角度对“三个务必”这一重大理论的意义进行阐释，促进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以期引起学界的共鸣。

一 “三个务必”的哲学基础

为充分凸显和进一步阐释“三个务必”这一理论的学术涵养，本研究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该理论所具有的深厚的哲学基础作初步的探讨。

（一）“三个务必”坚持和运用了实践第一的观点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性之一。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以往的全部哲学，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②。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的基础上阐述了实践在认识论乃至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时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③实践形成了包括社会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人们通过实践创造自己物质成果的同时，也创造着自己的精神成果。历届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面对不同的社会矛盾和历史任务在解答不同的时代课题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因此，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④。

“三个务必”就是在坚持和运用实践第一的观点的基础上而产生的重大理论成果。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风云变化，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国际力量对比加速变化，地区冲突热度不减，全球发展鸿沟更加突出，全球治理的不稳定不确定性愈加凸显。再加上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就要求全党同志要牢记“三个务必”，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

（二）“三个务必”坚持和运用了质量互变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质量互变规律亦称“量变质变规律”、“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规律”，它是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之一。这一规律的基本内涵主要有：第一，事物的发展变化存在量变和质变两种基本形式，量变是一种连续的、不显著的变化，而质变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是渐进过程的中断，是由一种质的形态向另一种质的形态的突变；第二，事物的发展从量变开始，当量变达到一定的界限时，量变就转化为质变，推动事物性质发生变化，这样，旧质事物就转变成了新质事物；第三，质量互变规律还强调，量变中有阶段性的和局部性的部分质变，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等等。

“三个务必”正是在坚持和运用质量互变规律中应运而生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整个过程中的阶段性质变。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描绘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宏伟蓝图，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新征程之“新”体现在方方面面，其中包括战略目标内涵的丰富拓展，例如，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等等。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将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复杂。在这个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第52页。

② 弗·恩格斯《致威纳尔·桑巴特》（1895年3月11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6页。

③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2—10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4页。

④ 习近平《提高解决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关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1页。

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要“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①,就必须要求全党同志牢记“三个务必”,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障。

(三)“三个务必”坚持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过程论思想

恩格斯指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②。这里的“既成事物”就是指已经生成且一成不变的事物,如果把世界看作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就忽视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处于一种“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③这一事实。因此,恩格斯的这一经典论述深刻揭示了: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即事物自身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中的一切现象都是作为一个过程而向前发展的。

“三个务必”这一重大理论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三个务必”是对毛泽东同志“两个务必”的继承、发展与创新。无论是“两个务必”还是“三个务必”,这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征程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重要的号召和警示。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赢得革命全面胜利,进而执掌国家政权的“大考”关头,毛泽东同志郑重提出了“两个务必”;在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意气风发迈上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重要节点,习近平发出“三个务必”的重要号召。虽然“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所面临的时代课题不完全相同,但它们两者在思想内容上具有与时俱进的一脉相承性,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在奋斗目标上具有高度统一性。“三个务必”在坚持与发展“两个务必”的历史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既与时俱进又一脉相承的关系就是马克思主义过程论这一重要哲学基础的集中体现。

(四)“三个务必”体现了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原理

整体与部分,亦称全局与局部,是一对极其古老、使用极其广泛的辩证法范畴。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主要表现在:第一,整体与部分相互包含;第二,整体与部分相互转化;第三,整体不一定等于部分之和。整体与部分之和是否相等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现代系统论的整体性原理往往被表述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主要是指功能而言的,说明部分之间的事物产生了新的功能。一种情况是整体具有部分根本没有的功能,不是功能大小问题;另一种情况是整体的功能大于各个部分功能之和。当同样数量的手工业工人和手工工具分工合理,团结协作之时就会产生“新的力量”,进而使整体大于部分的简单相加。现代系统论的最优化原则就是要选择最优的结构形式,使整体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功能。

“三个务必”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的功能远远大于这三个单个的务必的简单相加。“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全党同志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必须具备的宗旨意识,这为树立远大理想筑牢了信仰根基。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当作自己的初心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全党同志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必须具备的思想方法,这为践行党的宗旨意识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引。党诞生于艰苦年代,走过苦难岁月,一直保持着吃苦耐劳精神,把艰苦奋斗当成接续奋斗的传家宝。“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全党同志在新的赶考之路上需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和素养,这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供了重要的实现路径。

“三个务必”之间并不矛盾,相反,它们处于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得益彰的辩证统一之中。尽管“务必谦虚谨慎”与“务必敢于斗争”看似有冲突,但从根本上说,它们两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三个务必”之间这种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共同构建起了一个集“宗旨意识—思想方法—实现路径”于一体的具有“总体性”特征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功能远远大于这“三个务必”简单相加的总和,这是对整体与部分辩证关系原理中蕴含的“整体大于部分的简单相加”这一原理的深刻阐释。

二 “三个务必”的理论蕴涵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第52页。

② 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0页。

③ 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0页。

“三个务必”的理论蕴涵极为丰富,本研究从全面从严治党维度对其理论意蕴进行阐释。

(一)“三个务必”彰显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经过长期的比较、鉴别、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等各方面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①。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创新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指引和开辟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新形态中凸显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作出制度化规定,并上升到根本制度的高度,明确规定了这一根本制度的具体内容、实现路径。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第一位的就是要推动全党全社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我们党的学习制度化、规范化。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三个务必”就是要进一步阐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②。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必须坚持学精悟透用好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既要“塑形”,更要“铸魂”,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③。“三个务必”可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我们自觉学习、践行“三个务必”就是彰显“中国之治”制度优势的一个具体行动。

百年来,无论形势和任务发生怎样的变化,即便是“狂风暴雨”,我们党都能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这一切都归根于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这是“中国之治”制度优势的根本所在。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在胜利面前,全党同志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经受住执政考验,进而提出了“两个务必”,这对于全党坚持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一制度优势有重要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植于人民性立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理想旨趣在理论基础、历史底蕴、理想情怀方面彰显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坚守人民立场、坚定理想信念,在勇于自我革命中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踔厉奋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④历史昭示我们,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坚持“人民立场”、坚守初心使命,才能铸就党的百年辉煌。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先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建构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教育与实践长效机制,这正是我国制度优势鲜明的价值底色。

(二)“三个务必”有力保证了我们党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⑤。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首先就要准确把握大党的共同特征。从狭义来看,大党不仅仅党员数量规模大,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也有大的难处”^⑥。从“大也有大的难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第16页。

② 习近平《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6年7月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第44页。

④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页。

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第63页。

⑥ 习近平《贯彻落实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2020年6月29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03页。

处”到“大党独有难题”的转变就表明我们党对“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习近平用了“六个如何始终”^①深刻揭示了我们这个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所处历史方位、肩负使命任务、面临复杂环境的清醒认识,为我们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是落实党的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而“三个务必”同样也是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各项建设工作,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政党自觉的鲜明特征。这种政党自觉不仅能让政党认识到自身的优势,还能清醒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有利于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使我们党在未雨绸缪中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习近平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②这种政党自觉蕴含的历史主动精神是我们正确预判时代发展方向,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内驱动力,也是激发全党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实际问题,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精神之源。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越是在辉煌胜利之时,越要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越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即是说,“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能促进我们党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中的“谦虚谨慎”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拜人民为师、请教于民并积极采纳人民意见的这种谦和态度上,而“艰苦奋斗”则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在苦难中愈挫愈勇,在磨砺中奋发有为的强烈责任意识。“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守好江山责任重大。”百年光辉历史铭记着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一路走来的千辛万苦,铭记着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谋复兴一往无前的千难万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克服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突破敌人四面八方的围追堵截;在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艰苦奋斗,涌现出一大批艰苦奋斗的光辉事迹和英雄楷模,锻造出许多反映时代风貌的中国精神,“新长征路”道阻且长,“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③。由此可知,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作为一种科学的工作方法和强烈的责任意识也能促进我们党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斗争和担当都是一种责任,敢于负责才是真斗争、真担当。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④,这里的斗争就是勇敢而又坚决地同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中国共产党善于在结合具体实际中不断增强斗争本领,发现真理,修正错误,在斗争中求发展,谋求团结进步,有力促进我们党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三)“三个务必”为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精神动力

“所谓‘历史周期率’,是指古代封建王朝历经治乱兴衰而出现的政权周期性更迭的历史现象,其实质是能否实现长期执政的问题”^⑤。从哲学意义上说,这一政权周期性更迭的历史现象的根源就在于社会基本矛盾即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⑥这一经典论断强调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即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当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时就要相应地变革与之不相适应的原有的生产关系。马克思的“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深刻阐明了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及社会发展规律。因此,一旦统治者无视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而傲慢地凌驾于人民之上,“人心向背的历史铁律最终会

①“六个如何始终”即“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参见:习近平《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保障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人民日报》2023年1月10日,第1版。

②习近平《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6年7月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2—33页。

③习近平《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49页。

④《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9页。

⑤韩振峰、米亨《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及其内在统一关系》,《求实》2023年第1期,第4页。

⑥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2页。

加速‘政怠宦成，人亡政息’历史悲剧的上演”^①。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畏艰辛困苦，在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中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②。这“两个答案”既与时俱进，又高度关联，在实现外部监督和自我监督的内外兼修、有机结合中共同致力于解决如何实现长期执政这一历史性发展难题。

“三个务必”为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提供了精神动力，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制度保障上为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提供了体制机制创新的样本。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使党能够更好更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例如，“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是我们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规律而实现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这对进一步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制度治党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习近平指出，通过健全制度、完善机制，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常新^③。历史和实践证明，我们党“在腥风血雨中能够一次次绝境重生”^④，就在于我们党能够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这就要求全党更要恪守党的性质宗旨，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推动全党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提供制度保障。

第二，“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能够使共产党人一以贯之地保持着忧患意识这一政治本色，在积极有为的砥砺前行中积聚起坚不可摧的力量。无产阶级革命是要“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和“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而不是像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长期沉溺于消沉状态”^⑤。人类进步史证明，一个政党如果缺乏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即便是大党、老党也存在有可能被小党、新党快速瓦解并取而代之的风险。因此，“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中蕴含的自警自省的批判精神、永不懈怠的进取意识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内在逻辑。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是习近平提出的“三个务必”的思想源头。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强调，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三个务必”，再次强调“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集中彰显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面对成功和胜利自警自励的政治智慧和求真务实的政治品格，面对艰难困苦不畏缩、不消沉，依靠自身力量赢得历史主动的坚强意志。

第三，“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处理党所面临的“疑难杂症”的高超智慧和坚韧力量。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在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讲话中就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作出深刻分析、提出明确要求。其中，防范化解党的建设领域重大风险必须坚持“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有机统一，这是增强党的斗争本领与斗争艺术有机统一的内在需要。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在总结党的百年历史经验时，特别强调了“坚持自我革命”这条重要经验，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⑥进行自我监督是一场艰苦卓绝的自我斗争，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⑦。要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就必须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决不姑息。要坚持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治理，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① 韩振峰、米亨《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及其内在统一关系》，《求实》2023年第1期，第5页。

② “两个答案”即毛泽东提出的“民主新路”和习近平提出的“自我革命”。参见：韩振峰、米亨《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及其内在统一关系》，《求实》2023年第1期，第4页。

③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人民日报》2019年11月4日，第1版。

④ 习近平《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2019年6月24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30页。

⑤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2页。

⑥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70页。

⑦ 习近平《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98页。

腐,进一步健全完善惩治行贿的法律法规,严厉打击那些所谓“有背景”的“政治骗子”;要发挥党委(党组)的主导作用,持续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把巡视巡察利剑磨得更光更亮,做到利剑高悬、震慑常在。纪检监察机关在攻坚战持久战中必须始终冲锋在最前面,忠诚于党、勇挑重担、敢打硬仗、善于斗争。

(四)“三个务必”强调了要在攻坚克难中牵住“关键少数”这个“牛鼻子”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中出现攻坚克难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当下改革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建等领域相互交错的、复杂性的综合改革,只要任何一个领域遭遇安全威胁,就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风险连锁联动效应。第二,当下的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利益格局固化板结,所以,具体改革方针政策一定要以当时当下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忌因故步自封而止步不前。第三,破解“怎么改”这一重大历史性课题就必须科学认识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而正确处理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五大关系”^①也是前无古人的艰巨探索,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可循。

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重大风险,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三个务必”为引领,在攻坚克难中牵住“关键少数”这个“牛鼻子”。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首先强调的是要敢于斗争。群雁高飞“头雁”领。习近平强调:“要发挥领导干部‘关键少数’的模范带头作用。”^②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一把手”坐镇中枢、指挥四方,其作风形象、精神状态如何就决定着工作推进的速度和成效。“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③，“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严管好各级领导干部”^④。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干部队伍还存在“灯下黑”、“手电筒照别人不照自己”等问题。这就需要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发挥“领头雁”的作用，行之以躬、负起总责，敢“较真”、敢“叫板”，让“火车头”把整个班子升级为“动车组”，引领广大党员以身作则、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激发起上行下效的整体效应。做事总是有风险的，不是所有的事都是四平八稳、顺风顺水的。正因为有风险，才需要有担当。“越怕事越容易出事，越想绕道走矛盾就越堵着道”^⑤。相反，只有豁得出去，真刀真枪干，不推诿、不逃避，不畏缩、不躲闪，敢于啃最硬的骨头，善于接最烫的山芋，才能真正历练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慎终如始的思想品格。

敢于斗争强调的是敢字当头，而善于斗争则强调的是要讲究斗争艺术。发挥“关键少数”的“领头雁”作用就要坚持以灵活的方式方法、高超的斗争艺术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第一，斗争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根据形势需要，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第二，斗争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毛泽东的“十个指头弹钢琴”^⑥强调的就是要讲究斗争艺术。第三，斗争要坚持实事求是，精准发力。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习近平提出的“三个区分开来”^⑦的要求，根据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科学治理、精准施策、主动作为、敢于担责，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防范化解前进道路上有可能出现的各种新风险。

①“五大关系”即“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参见：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页。

②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11页。

③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月8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6页。

④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5年3月5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页。

⑤习近平《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2021年9月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530页。

⑥毛泽东强调的“十个指头弹钢琴”的基本意涵是：“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参见：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42页。

⑦“三个区分开来”基本内容是：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参见：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24页。

三 “三个务必”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意义

“三个务必”对防范化解政治、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挖掘“三个务必”中蕴涵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方法论意义,“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①有力促进国家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一)有利于保证全面深化改革蹄疾步稳,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改革开放的深刻性、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必须坚持和运用好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我国国情出发,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状出发,以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 as 落脚点,更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观点和做法,而是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反对轰动效应和做表面文章。绝不能把“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②这一现象错误地认为是“不改革”;更不能把改革开放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归根结底在于我们始终坚持“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③,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长期以来,各种敌对势力从来没有停止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企图在我国策划“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我们必须牢记“三个务必”,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确保改革开放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三个务必”是以党性教育的方式唤醒全党要从思想深处自觉地增强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增进制度自信,进一步维护和塑造我国政治安全尤其是制度安全和政权安全。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是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树立宗旨意识,切实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进而更加牢固地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信念。

(二)有利于用制度刚性打通制度堵点,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优化制度供给

当前,我们亟须进一步完善利益表达机制,要以各种利益平衡者和仲裁者的身份为立足点来优化制度供给,为社会各个阶层搭建表达利益诉求的制度平台。但在实践层面将有可能遭遇很多“卡点”和“堵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用制度刚性打通制度“卡点”和“堵点”,在克服利益固化的藩篱中构建充分反映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

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解放思想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的前提条件,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查明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跳出条条框框的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等。“三个务必”中的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我们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柱和科学的斗争方式。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锤炼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和顽强品质,是我们党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的重要密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历史,就是不断展示斗争气、斗争勇气、斗智慧、斗力量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都是奔着风险挑战和矛盾问题去的。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啃下重点领域改革的硬骨头,治理生态环境等都必须要在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中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只有发扬斗争精神,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才能攻克一个个看似不可攻克的利益固化藩篱的难关险阻。

(三)有利于坚持“总体性”方法论思想有力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

风险的“连锁联动”效应既是对国际形势波谲云诡背景下全球风险的高度复杂化特征的概括,也是对我国当下全面深化改革正处于关键期、攻坚期、窗口期这三期叠加而形成的各类风险挑战累积叠加、各类系统性风险增多、各类风险联动性增强现象的描述。为了强调防范化解风险的“连锁联动”效应,习近平提出了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第52—53页。

② 习近平《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2012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9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

“五个不让”^①重要论断。当前的风险的“连锁联动”效应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压缩的现代化”极易形成“共时性”风险,而“共时性”风险常常表现为以系统性风险为主要形式的重大风险;体制机制变革与制度创新还不能完全满足多样性、多变性、深层次、宽领域、高质量的“人民的需要”,这就必然会出现风险分配不正义等问题;“变异”的“四风”问题影响党的先进性,会弱化党的纯洁性,且具有很强的危险性和破坏性。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不能靠“单打一”的政策和制度,而要综合施策,系统治理,要运用“总体性”方法论破解结构性矛盾和系统性风险有可能带来的风险连锁联动效应。

如前所述,“三个务必”之间这种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共同构建起了一个集“宗旨意识—思想方法—实现路径”于一体的具有“总体性”特征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总体性”方法论恰恰锚定的就是有力有效应对风险连锁联动效应这一目标。尤其是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化,部门之间的关联性增强,组织结构更加复杂这一背景下,部分风险责任主体借此复杂的结构性关系试图掩盖和逃避自己本应担当的风险责任,这就对运用“三个务必”中蕴含的“总体性”方法论特征防范化解各类风险连锁联动效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有利于防止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在处理国际复杂局面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格局得到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得到深刻重塑。这种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使得国际关系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多边主义遭遇逆流。“民主赤字”、“治理赤字”、“发展陷阱”相互交织叠加。面对国际复杂局面,我们必须坚持以“三个务必”为引领,尤其是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才能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场攻坚战、持久战。要着力推进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坚决维护国际法基本原则,坚持忠诚履行国际义务原则,坚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不论社会制度异同,都应相互尊重主权、平等相待、和平共处。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国家安全风险变化的新趋势,要坚决防止各种风险挑战传导、叠加、演变、升级。要善于运用制度的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尤其是要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主动加强协调配合,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从维护政治安全的高度,做好各领域各地方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工作,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习近平指出:“人类面临的所有全球性问题,任何一国想单打独斗都无法解决,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②面对世界和平发展的共同问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要在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共同诉求中建立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体系,开辟一条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全新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决防止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

“三个务必”的哲学基础、理论蕴涵及其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意义这三个方面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具有高度关联性的有机整体。“三个务必”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意义就是从其理论蕴涵中进一步延展出来的,这有效促进了“三个务必”这一命题的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

[责任编辑:何毅]

^①“五个不让”即“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82页。

^②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2021年1月25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461页。